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稿

· 上 编 ·
第五卷

本卷主编 王思治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稿

· 上编 · 第五卷

本卷主编 王思治

中 华 书 局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
科重点项目之一，曾得到国家资助。

清代人物传稿

上编 第五卷

本卷主编 王思治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3¹/₄印张·2插页·301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统一书号：11018·1497 定价：3.85元

ISBN 7-101-00186-6/K·81

卷 头 语

本卷至第十卷,所收录的是康、雍时期的清代人物。收入本卷者则主要是康熙朝的人物,共五十二篇,五十三人(其中合传一篇)。除康熙帝及其皇长子、废皇太子和辅政四大臣外,多数是康熙朝前期的大学士(有的是理学名臣)、督抚,一些学者思想家,少数民族重要人物,起事首领、著名工匠。

本卷收录的人物中任经筵讲官者不乏其人,他们对康熙的影响应该各有不同。各传作者力求探索这一点。如《熊赐履传》认为,熊赐履对康熙的影响多是儒家经籍所阐述的为君治国之道;《徐元文传》则认为,徐元文对康熙的影响主要是有关历史兴革。在尽可能充实传主关键史实的材料方面,有的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如辅政大臣鳌拜欺凌幼君,擅权自专,罪行重大,众议当斩。《鳌拜传》据(法)白晋《康熙帝传》的有关记载:鳌拜请求谨见皇帝,让康熙看他因救太宗皇太极力战负伤留下的累累伤痕,康熙颇为感动,鳌拜因而得以免死,比《实录》的有关记载较为具体。杨起隆起事,以朱三太子为名,材料分散,作者连缀成文,力图勾画出其过程。关于这次起事,另有记载说,是吴三桂子吴应熊暗中组织,意在尽歼清廷执政各官,以应其父,则见于《玄烨传》的附注中,以存一说。

康熙帝玄烨,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占清代前期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是清王朝建立全国政权后巩固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充满着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年代。康熙帝和

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坚定措施,平定叛乱,清除割据,抗击外来侵扰,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历史业绩。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也是有声有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它以其时代特色垂之青史。可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本卷各传恐难尽如人意,而且本卷所收录者也只是康熙朝的一部分人物,因此尚不足以窥其全豹。

这里仅就有关的几个问题略作说明:

(一) 清政府和康熙经过同国内外各种势力长期艰巨的军事斗争,取得了胜利,清除了分裂;对周边地区实行建制管辖和有效的行政管理(新疆、西藏到乾隆时才最后完成,西藏于雍正五年设置驻藏大臣),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领土疆域也最后稳定下来。清代前期对祖国历史的这些重大建树,应该说是可以彪炳于史册的。

(二) 历史的辩证发展表明,一个落后的民族在军事上的胜利,起初会给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又不得不适应比较高的经济状况,“征服者被征服”——这是历史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满族从努尔哈赤时起处于急剧发展的上升时期,但与汉族相比,仍然远为落后。一个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全国政权,不可避免地会把某些落后的经济形式强行移植到经济发展较高的关内。清统治者用暴力圈占大量土地,建立起具有农奴性质的各类庄田,以及强迫汉人“投充”,掠卖人口,等等,既有民族压迫的形式与内容,又有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内含。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实质上是先进与落后两种生产形式的冲突。康熙亲政以后,对政策进行了调整,以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尤其是平定三藩之乱、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安定的政治局面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正如清

人所说：“自康熙二十年（是年三藩战事结束）以后，海内始有起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社会生产从清初凋敝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清王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恩格斯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被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清代历史的客观进程的确是如此。

（三）康熙帝执政时期，他无疑是居于历史舞台的中央，处于极其引人注目的地位。他被《清史稿》称誉为“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清史稿·圣祖本纪·论》）自从汉代董仲舒倡言“天人感应”的“君权神授”的神学体系以后，封建帝王乃是“天纵之圣”，便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反复说教的口头禅。康熙同样被吹捧为“智勇天锡”。康熙本人虽然也认为“凡帝王自有天命”（萧爽：《永宪录》卷1），又说：“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天。”（《清圣祖实录》卷234，第15页）但他却不认为天子与凡人有什么不同之处。这反映了他天道观的矛盾。在其晚年，他发布上谕明白宣示廷臣：“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祲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敢，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清圣祖实录》卷275，第11页）康熙以八岁孩稚即位，十四岁亲政，数十年“以实心行实政”，取得了巨大的历史业绩，他在完成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生产，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是解决了当时历史所面临的诸多矛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由于他好学敏求，勤于

政务,从实际斗争的磨练中,使一个八岁幼童成长为一代杰出封建君主。康熙既代表了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也是他那个时代造就了康熙这一历史人物。

王思治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玄 烨	王思治(1)
允 初	王思治(45)
允 禔	王思治(54)
索 尼	李鸿彬(62)
苏克萨哈	刘建新(72)
遏必隆	刘建新(81)
鳌 拜	王思治(89)
朱昌祚	刘建新(102)
李 蔚	王思治(108)
孙廷铨	李鸿彬(115)
王 熙	李鸿彬(121)
伊桑阿	王思治(129)
吴正治	徐 凯(138)
宋德宜	李鸿彬(143)
徐元文	王宏钧(149)
李之芳	李鸿彬(158)
熊赐履	杨辉君(167)
李光地	王政尧(179)
魏象枢	王政尧(191)
赵申乔	王政尧(200)

汤 斌	张晓虎(209)
陆陇其	张晓虎(218)
张伯行	徐 凯(224)
王士禛	刘如仲(232)
张玉书	刘如仲(238)
张 英	王政尧(245)
富宁安	赵云田(253)
蔡毓荣	吴兆清(260)
董卫国	刘风云(269)
温 达	赵云田(275)
米思翰	王思治(279)
李率泰	何珍如(284)
李 清	黄爱平(290)
陈 确	王俊义(295)
李因笃	赵 侃(305)
张履祥	张晓虎(312)
陆世仪	张晓虎(317)
张 岱	吕英凡(321)
查继佐	张晓虎(326)
黄虞稷	黄爱平(334)
顾祖禹	黄爱平 吕 坚(339)
徐 枋	张晓虎(348)
冒 襄	张晓虎(353)
曹 寅	李丹慧(359)
张 涟 张 然	张晓虎 刘建新(369)
杨起隆	王政尧(375)

阿帕克和卓.....	马汝珩(380)
杨 岫.....	李鸿彬(386)
龚 贤.....	刘如仲(390)
禹之鼎.....	陈金陵(396)
叶 桂.....	吕英凡(400)
张志聪.....	吕英凡(408)

玄 烨

王思治

玄烨，姓爱新觉罗氏，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他八岁即帝位，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年号康熙。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卒，年六十有九。

康熙帝玄烨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他自幼好学不倦，意志坚毅，目光敏锐，从青年时起就敢于有所作为。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前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经过对内对外的长期斗争，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康熙集中精力孜孜以求治，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社会经济因而从清初凋敝状态中得以复苏和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他被清人称赞为既是守成之君，又是开创之主。康熙一生的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历史业绩，留下了引人注目的历史篇章。

（一）亲政前后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元旦，清宫内一片冷清肃静，每年举行的朝贺大典，因皇帝身体不适免于举行。翌日（初二），顺治帝福临病发，他染上了当时认为十分可怕的出痘之症（天花）。初六日，福临病势垂危，召原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命撰遗诏，一一自责，定皇三子名玄烨，年八岁，立为皇太子。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翌日（初七）子夜，福临逝世，年仅二十四岁。颁遗诏于天下。初九日，玄烨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康熙元

年(1662年),尊祖母博尔济特氏(孝庄文皇后)为太皇太后。

玄烨在福临诸子中所以得立,是太皇太后经过慎重考虑选择决定的。^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不致再象他父亲那样,因为这种可怕的疾病而早逝。^②但他的脸上却留下了不太显眼的痘痕。在他成年以后,麻脸并未影响他的威仪,一位常常见到康熙的传教士写道:“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③

康熙二年二月,玄烨生母佟氏^④去世,年二十四岁。幼年皇帝由祖母太皇太后抚育。十分能干而又有政治远见的孝庄文皇后,为教养康熙早日成立,费尽心血,“这孩子是立于他祖母的影响之下”。^⑤即使在康熙亲政之后,太皇太后仍时时告诫他勿忘“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⑥康熙对祖母的教诲奉命惟谨,他“刻苦练习百般武艺”,弓马娴熟,能开强弓,“无论徒步或骑马,立定射击或快跑射击,他都能左右开弓。箭射飞禽走兽,很少虚发。各种武器,包括人们现在已不再使用的,他都件件精通。”就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火器,他也能使用自如。^⑦康熙身为表率以重武,继承其列祖列宗骑射开国的尚武精神,为的是使八旗劲旅常备不懈,以确保清王朝的统治。孝庄文皇后又作书勉励他说,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一人临其上,故须深思如何得民心,方能得国之道。只有使四海安居乐业,清王朝的统治才能“绵历数于无疆”。所以为君者应“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慎尔出话,夙夜恪勤”。孝庄文皇后期望康熙光大祖宗基业,如此,她才不会内疚而心有所不安。^⑧孝庄文皇后的谆谆教诲与勉励,对康熙一生的行政设施,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他后来曾说自己“设无祖母无以成立”,“设无祖母无以至今日”。康熙自幼

受其祖母的教养，祖孙二人感情甚笃，而他对其祖母更是敬礼有加，谨慎爱护，备尽孝道。

清制：母后不得预政。在康熙亲政以前，朝政掌握在辅政四大臣手中，逐渐形成鳌拜欺凌幼君，结党擅权的政治局面。

鳌拜专权跋扈，时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或高声质问，或呵责部院大臣。凡事在家定议后施行，稍拂其意者辄置之死地，曾矫旨诛杀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事具《鳌拜传》及《朱昌祚传》。

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上书云：“世祖章皇帝(福临)亦十四岁亲政，今上年德相符”，奏请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康熙“躬亲大政”。^⑥辅政大臣仍行佐理。

鳌拜根本不把业已亲政的康熙放在眼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鳌拜议事多不合，积怨成隙。鳌拜加以不愿归政罪名，论其“怨望”，“有异志”，应凌迟处死。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与其党班布尔善等构成其罪款，必欲置之极刑，坚执不允所请”。^⑩鳌拜竟然气势汹汹与康熙强争累日，竟将苏克萨哈处绞，诛其族。康熙深感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⑪决意清除鳌拜集团。然而，鳌拜党羽遍布内外，若明降谕旨，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⑫康熙不露声色，用小内监习布库(摔跤角力)，擒拿鳌拜。^⑬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谕令议政王大臣严勘鳌拜及其同党。事详《鳌拜传》。清除鳌拜及其同党，是康熙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清初一大案件。其时，康熙年仅十六岁，少年皇帝果毅决断，遇事沉着冷静，敢作敢为的魄力，在有清一代受到了高度的称颂。

清除鳌拜集团之后，康熙立即发布上谕说：“朕夙夜图治，切念民生艰难，必加意抚绥，各俾安居乐业，乃成久安长治之道。”^⑭为

此,严令禁止鳌拜专权时内外官员嘱托行贿,苟图倖进之风;“以后务须洗心改过,恪守法纪”,否则定行从重治罪,决不宽贷。^⑮对“贪官污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康熙痛加申斥。为了整肃官方,他谕令大学士、尚书及三品以上官员,自陈优劣;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详加甄别具奏。督抚大吏由吏部查明任内功过,称职与否,详加甄别具奏。对一些官场恶习,如大小文武官员,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以馈送亲友,康熙认为,“此等违法妄行,好生可恶”。命令“以后著永行严禁”。^⑯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鳌拜紊乱朝政,以致吏风颓坏而采取的。

清除鳌拜集团之后,康熙才真正掌握了实权,开始了他励精图治、完成国家统一,对清王朝来说乃是“守成而兼创业”的宏伟事业。

(二) 完成国家统一

康熙虽然期望长治久安,但他亲政之初清王朝的统治尚未稳定,国家还未实现统一,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南方有业已坐大的“三藩”割据势力;东南海上有台湾郑氏抗清力量;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民族分裂势力正在日益发展;东北黑龙江流域沙皇俄国的侵扰已达数十年之久。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首先是“三藩”。亲政伊始的康熙,对日益嚣张的“三藩”势力,忧心忡忡,日夜难安,他说:“朕自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靡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⑰

“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五尚可喜。^⑱清军入关后,“三藩”竭力效劳于新主,是镇压农民军和抗清力量的急先锋,并因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辅政大臣鳌拜执政期间,他们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云南的吴三桂是三藩中力量最强者,他有功于清也居三藩之首。吴三桂盘踞云南十余年,云贵督抚也要受其节制,知县以上官吏,“令投身藩下蓄为私人”。他有权选授

官吏将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号为“西选”，“西选官吏遍天下”。当时，“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①“三藩”索饷，稍有迟绌，动辄连章入告，挟持朝廷，用钱也不受稽核。他们各自横掠一方，广征关市，榷盐、重敛，甚至“潜行海外私贩，肆行无忌”。^②“三藩”已发展成为封建地方割据势力。吴三桂乃久经沙场的宿将，“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所部五十三佐领，绿营兵万二千人。其时，满族善战的开国诸王和著名将领多已故去，吴三桂自以为天下无敌，^③视年轻的康熙“乳臭未脱”，更非其对手，因而有恃无恐，久蓄异志，密计反叛，分裂中国，与清廷南北分廷抗礼，称帝南方。

年仅二十岁的康熙，鉴于历史上藩镇强大，尾大不掉，势必与中央政权抗衡，屡屡称兵作乱，危害国家统一，因而认为必须撤藩。他说：“朕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④又说：“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⑤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因年老请归辽东，以其子尚之信嗣封留镇广东。康熙不允，趁此令其撤藩归辽东。吴三桂、耿精忠获悉后，于七月间分别上书请撤藩，以试探康熙旨意。康熙下廷臣议，诸王大臣慑于吴三桂的军威，皆主勿撤；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徙藩。康熙力排众议，断然下令撤藩，他说：“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痍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⑥果然，撤藩令下，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举兵反，主力出贵州，掠湖南，分兵攻四川，发布檄文，“四方诱煽”。各地总兵、提督纷纷倒戈投吴，数月之间六省皆陷。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广东尚之信、福建耿精忠，也起兵响应，半个中国又陷入战火，形势十分险恶，清王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当吴三桂的反讯传至京师，举朝震动。一些大臣被吴三桂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大学士索额图竟然请诛主张撤藩诸臣，以谢三桂。

康熙却不诿责于人,谕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立即进行全面军事布署,决心讨平叛乱。吴三桂子额附吴应熊,长期居住北京,“朝政纤悉,旦夕飞报”。^{②5} 康熙下令将其逮捕,^{②6} 不久将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死。^{②7} 这是吴三桂始料所不及的。他原以为康熙不致处死其子,以便留有回旋余地。当吴应熊被处死的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进食,闻讯大惊,推案而起,说:“上(康熙)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②7} 始知低估了少年皇帝,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气焰因而大挫。康熙后来说:“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谓乳臭未脱,及闻驿报神速,机谋远略,乃仰天叹曰:‘休矣!未可与争也。’”^{②8} 康熙十四年四月,吴三桂授意达赖喇嘛上奏康熙云:“若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②9} 康熙对此分裂中国的建议,断拒绝,痛加驳斥,谕曰:“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三桂)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③0} 康熙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毅然命将出师,进行征讨。经过八年战争,终于平定了叛乱。

“三藩”战争对年轻的康熙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几年来,他常常深夜难寐,在题为《夜半》的诗中,康熙抒发自己的心情说:“夜半无穷意,心为念万方。”他的心牵挂着数千里外的各个战场。另一首题为《夜至三鼓坐待议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的诗云:“午夜迢迢刻漏长,每思战士几迴肠。海东波浪何年靖,日望军书奏凯章。”他为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劳心焦思,日以继夜。康熙从战争中得到了锻炼,表现出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对各战场清军的指挥,常常先命前线将领和督抚提出意见,再命议政王大臣或九卿会议具奏。对一些关系重大的战役,则谕令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营垒形势图进呈,在反复研究战场形势图之后,决定作战方略。^{③1} 其时,“每日军报三四百疏,(康熙)手批口谕,发踪指示,洞的中窾。遵命者罔不摧敌,违机者罔不钝衄。”^{③2} 事实虽然并非完全如此,但就

“三藩”战争的全局而言,正如康熙后来经常提到的那样,的确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康熙注意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从战争学会了战争,成长为杰出的统帅。

“三藩战争”对清王朝来说是生死存亡之战。在取得胜利之后,群臣纷纷上疏请上尊号,说“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③康熙对这类溢美颂扬之词,却不以为然,断然不允。他反复告谕诸王大臣,说明不允上尊号的原因:其一,平定“三藩”叛乱,“若以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④故决非皇帝一人功德所致;其二,“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⑤吴三桂在讨清文(即所谓“伪札”)中声称,“夷君无道”,“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华冠裳”。三十年(顺治元年至康熙十二年)来,他隐忍艰晦以待时,而今“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谋义举。”^⑥提出“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华之乾坤”。吴三桂以民族战争相号召,假以“大义”,各省相率叛清。康熙从这一事实中认识到,其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于清王朝的统治尚未深得人心,吏治未能厘正所造成的。是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后实行种种民族压迫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他能从叛乱中反躬自省,并对政策进行调整(见下面),表明康熙不愧为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其三,正因为如此,康熙一再表明,他所关心的是八年战争,生民涂炭,“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敝于转输,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每一轫念,甚歉于怀。”^⑦总之,“三藩”战争已使国家元气大伤,满目疮痍,康熙告诫诸王大臣: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⑧故而“上尊号一事,断不可行,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⑨他指出,当务之急乃是“恤民养民”,“使兵民得以休息”,“永消异日之隐